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的分析

Soviet Marx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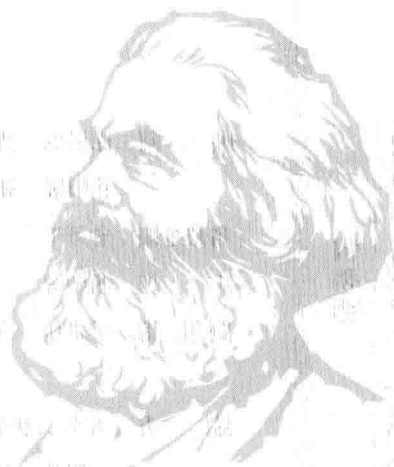
A Critical Analysis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 著

张翼星 万俊人 / 译

黄振定 / 校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Karl Marx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的分析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 著

张翼星 万俊人 / 译

黄振定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 /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张翼星，万俊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51-9

I. ①苏… II. ①赫… ②张… ③万…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 IV. ①B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7285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的分析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著

张翼星 万俊人 译

黄振定 校

Sulian de Makesi 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1.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5 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美籍德裔哲学家, 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 16 岁那年,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 年, 他曾应征入伍。1920 年他入弗赖堡 (Freiburg) 大学学习, 就读于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 (M. Heidegger) 门下, 同时旁听现象学家胡塞尔 (E. Husserl) 的课程, 1922 年获博士学位。1932 年, 他来到法兰克福 (Frankfurt) 社会研究所, 与该所所长霍克海默 (M. Horkheimer) 一起, 积极开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活动。希特勒 (A. Hitler) 上台后, 他离开德国, 先到社会研究所设在瑞士日内瓦 (Geneva) 的办事处任职, 1934 年转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 (Columbia) 大学的社会研究所, 开始了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 成为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 (T. W. Adorno) 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40 年他加入美国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曾任华盛顿战略研究局研究员。1951 年, 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 (Harvard) 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1965 年在布兰代斯 (Brandeis) 大学、1965—1976 年在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1979 年 7 月 29 日, 他在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讲学途中逝世。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颇为激进的思想家。他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著述甚多, 概括地说, 他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系统而激烈的批判, 《单面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另一方面则是对苏联的某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考察。本书集中反映了后一方面的理论活动。全书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 是他在 1952—1953 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 (成立于 1946 年) 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 是他于 1954—1955 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

中心准备的。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58年，1960年再版，以后曾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作者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他首先自称，他的评论采取的是“内在批判”的方法，即从其理论前提出发，对其种种后果展开研究，依据这些后果来重新考察其前提。同时，作者认为，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苏联社会的内部结构外，还要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规定。就是说，苏联理论和政治的发展，都反映出西方相应的发展，反之也是如此。这种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历史发展的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范围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出现了另外的趋势，两个基本阶级之间冲突关系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阶级而行动。他把这看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意义的因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为基础的，并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作者以马克思的“原来学说”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比较，认为苏联的现实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后果，更不能说是这种学说的实现。全书的基本倾向是要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来学说。

所谓“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是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倾向”。他虽没有对这三种形式作出明确的原则区分，但也并没有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从革命初期的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经历了相当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也有利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中某些质变的发生。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源头在于列宁主义，但他仍把批判的锋芒集中于斯大林主义。

作者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比如，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概念和观点大都既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相脱离，也与原来马克思学说的含义相矛盾。作者极力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说它愈来愈成为政权统治的工具，只是为了实用和宣传，愈来愈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因而表现出行为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特征。

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原来的学说

马尔库塞一开始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最初的概念”。从社会主体方面立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总之，无产阶级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成为历史的动力。这正是马尔库塞作出分析、比较的出发点，是评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实现生产高效率的工业化。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要求直接生产者能够控制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分配，要求发挥无产阶级“来自下面”的主动；但在苏联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工业化，只不过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加速工业化。马克思虽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保持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包含了为国家消亡逐渐创造条件的含义。国家作为统治机器的职能应当逐渐削弱。但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异常环境里，苏维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体系不但继续存在和发展，行使压抑性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在日益加强，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已相去甚远。更有甚者，由于国家的职能、权力的日益强化，就势必形成一个管理国家和享有国家权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已经具有特殊权力的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俄国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国有化的经济组织，被集中地加以计划与控制，国家成了直接指挥生产机构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集体利益”。这种状况更加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

在文学艺术领域，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实际是自然主义的，主张文艺如实地描绘现实，要使文学艺术自觉而有控制地贯彻苏维埃国家的各项政策。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不但违背艺术本身的特点，而且苏联的美学把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的使命在于揭示“本质与存在间不可克服的对抗”当做“形式主义”来抨击，实际也抨击了艺术本身。这种对抗是一种历史事实，只有在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本质相一致的社会才能得到解决。艺术

是超越性的，苏联却通过行政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策法规，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并且成为粉饰现实的装饰品和调解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尔库塞说：“就其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因此，他认为苏联当时奉行的文艺理论与文艺路线，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

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曾经受到苏联理论界和正统马列主义者的严厉抨击与反驳。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是继承还是偏离？如何看待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的批驳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认为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制造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也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曲解。这当然有一定的根据。同时，西方学者中也有从方法上批评马尔库塞观点的，比如认为马尔库塞批判苏联的社会现实时，不是依据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实际情况，而是搬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批评苏联官僚阶层分裂出“特殊利益”时，也是原则多于事实，缺乏相应的实际材料；等等。对于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问题，马尔库塞逝世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实践，正在和将会进一步作出判明，我们不必过早地作出结论。

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而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斯大林主义则是把列宁的某些思想引向极端。可见他并没有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他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有重大区别，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的这种看法是包含合理因素的。

1. 对列宁主义的批评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首先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这是苏联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列宁把理论看做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反映，而不看做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和阶级意识的表现，联系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格言，这无异于使无产阶级从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只供利用的客体。这与马克思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

衷不相一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反复强调物质是不以人的感觉、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乃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提。马尔库塞认为，这便不是把主观与客观看做无产阶级活动中达到的统一，而是把二者分割开来。由此他指责列宁滑向了二元论。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因而谈不上“派生”或“反映”的问题。他认为列宁主张人要改造世界，必先认识世界，这种反映论是消极、被动的，忽视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论是只要反映不要创造的机械论，认为这种消极的反映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相违背的。

马尔库塞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某些观点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把列宁的整个认识论说成消极的反映论，则显然包含某些误解和偏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强调反映论，是与他同马赫主义者激烈论战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有所忽视，可说是某种缺陷，但这种缺陷，在列宁后来所写的《哲学笔记》中显然有所克服。列宁的认识论前后有重要转变和升华，马尔库塞有所忽视。至于马尔库塞指责列宁滑向二元论，更加缺乏根据，列宁从来没有把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看做两个平行、独立的源头，不论在认识论或历史观上，列宁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列宁主义的显著特点是：革命的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同盟者的作用。这正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性而提出的主张。在一般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正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发挥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思想并不一致。

马尔库塞认为，国际上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有所突破的思想，是起源于托洛茨基，列宁一开始就肯定了这一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仍然加以强调，并寄希望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列宁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潜力，低估了无产阶级的结构、地位和基本变化。因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仍然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由此而坚持使用的一系列正统的概念，显然与现实的形势、政策相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存在。

马尔库塞作出的一个评判是：“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

一。”这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断然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列宁主义的出现，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20世纪初开创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十月革命后，列宁又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实施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且提出了整治官僚主义、倡导政治民主、开展文化革新的一系列新举措。所以，与马尔库塞的论断相反，依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力图创新，才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特征。可见，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基本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2.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苏联在国际上曾经面对两类大的矛盾、冲突：一类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类便是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类矛盾是列宁同时承认并看做互相关联的，但列宁的路线、政策，是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础，苏联要加速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就必须利用这类矛盾和冲突。

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进入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马尔库塞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重复了三十多年，它显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相矛盾，因而人们往往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当然，这种“总危机”并不意味着一种革命形势或资本主义的崩溃即将到来，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把世界形势的格局看做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是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重新巩固；等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困扰苏联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相信其内部矛盾可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则需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革命才能最终消除。实际上内外矛盾是相互渗透的。斯大林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有时便把这种斗争转向国际舞台。马尔库塞认为，历史的进展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

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因此必须加强国内压抑性的政治、军事机构，而这种机构的日益加强，反过来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环境，甚至促进了它的国际联合。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内外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争端决定政治争端。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法作出如此概括：国家权力可能发展的最高目的，是为国家消亡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随后，他又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前和在过渡期间必须强化国家权力。这样，苏维埃国家不仅保持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相分离，而且经常用“资本主义包围”的“异常”环境来为国家的压抑性的“反常”现象辩护。马尔库塞还特别指出，这种压抑性国家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仅是政府官僚阶层的形成，不仅有官僚数量激增和等级制度严格的特征，更在于官僚特权地位的保持和提升。官僚阶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来控制基本民众，而这种控制的行使，又产生了控制中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苏联的官僚阶层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或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利益，但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被“国家”所僭取。这样逐渐形成的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使苏联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学术文化和物质生活等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在国际上发生过严重影响。马尔库塞着重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与危害，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斯大林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高度集中，着重发展重工业，才使苏联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了国防力量，因而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后来的苏联解体，正是由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后果。这两种看法显然存在严重分歧。马尔库塞的分析和批评，可供研究和评论者参考。

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重视辩证法。马尔库塞更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主要修正，不在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上，而在于辩证法的基本职能上的变化。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本来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这里，却被称为“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际上变成了僵化、固定的条例。他说：“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这种变化与马克思

主义从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相适应。这样，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便不再作为革命与实践的研究方法，而是进入既定统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便逐渐地被编纂为一种哲学体系。马尔库塞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越是难以分辨，辩证法本身就越是变成了形式逻辑。

在马尔库塞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就反对编纂一部教科书，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设想把辩证法发展为一般方法论图式。辩证的逻辑可以称为“自由的逻辑”或“解放的逻辑”。当然，黑格尔设想的自由，最终只是理念的自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却是应用于社会历史的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排除非历史的概括。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逻辑，却既不是在黑格尔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的意义上，因而便不再是解放的逻辑。他们只是从“经典”的分析中提取并图解某些原理，使之与某些“非辩证的”思想相对照。这些原理便列举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们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某些命题所作的释义，把自然领域的证实看做先于历史的证实。苏联马克思主义既然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世
界观，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两大块，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和哲学体系的一个特殊分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被编纂为一种意识形态，由党和国家的官方来作权威的解
释，为现行政策与实践作论证。

此外，马尔库塞还批评了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实用性特点和对辩证法内容的某些曲解。如夸大阶级斗争而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忽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质变的爆发形式；以及否定之否定的消失；等等。

总之，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重视辩证法，但有不同的思路 and 视角。正统马克思主义多半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把辩证法看做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把辩证法区分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的反映，试图建构一个包含辩证法基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的科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视角转向主体和人自身，认为辩证法只是人类思维或指导实践活动的一种方法，从卢卡奇开始，一般都否认自然辩证法，否认辩证法有几个固定的规律和范畴，反对把辩证法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法思想提出种种质